

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的成因及启示

——石油、金融联动视角下的分析

徐振伟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天津 300350)

摘要: 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粮食危机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均超过了之前的历次危机。并且,此次粮食危机与石油、金融之间存在密切的联动关系。一方面,油价的上涨增加了粮食产业链各环节诸如生产、运输、加工的成本,从而带动了粮价的高涨,并且美国基于油价高涨大力发展生物能源,人为制造的粮食短缺又进一步加剧了粮食危机。另一方面,美国为解决国内金融危机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元的过剩性流动和美元的贬值推高了国际粮价,而金融资本的投机炒作又加重了粮价飙升。在粮食能源化、粮食金融化的综合作用之下,粮食市场的波动性不断加剧,粮食的能源属性和金融属性逐渐突显。

关键词: 粮食危机; 粮食能源化; 粮食金融化

[中图分类号] F307.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34X(2024)02-0113-09

DOI: 10.16573/j.cnki.1672-934x.2024.02.012

The Causes and Enlightenment of Global Food Crisis in 2008: An Analysis From an Interactive Perspective among Food, Oil and Finance

Xu Zhenwei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The global food crisis that erupted in 2008 was much broader and deeper than any previous food crisis. Moreover, there was a close linkage between this food crisis and both oil and finance. On the one hand, the rise in oil price had increased the cost of production, transportation and processing in all links of food industry chain, thus driving up food price; furthermore, the United States had made great efforts to develop bio-energy based on oil high price, which had further exacerbated the food crisis by creating artificial food shortage. On the other hand, the United States had implemented a monetary policy of quantitative easing to solve his domestic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excess flow of and the depreciation of U.S. dollar had pushed up international food price, while the speculation of financial capital has caused food price to soar. Under the combined effect of food energization and financialization, the food market was increasingly volatile, and the energy and financial attributes of food became gradually dominant.

Key words: food crisis; food energization; food financialization

收稿日期: 2024-01-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2BGJ012)

作者简介: 徐振伟(1979—), 男, 副教授, 主要从事非传统安全研究。

自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世界进入了以美国为主导的“一超多强”格局。在苏联解体之前,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就说过:“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掌握货币,谁就控制了全世界;而谁掌握粮食,谁就控制了全人类。”^[1]苏联解体之后该论断依旧可行,美国通过粮食、石油、金融三个领域加强其对全世界运行秩序的控制。1974年前后爆发的第一次世界粮食危机就已经说明这条链条的客观存在。尽管在苏联解体之后的国际政治格局出现了明显变化,但是这样的联动传导机制却在2008年的全球粮食危机中进一步被证明。

之前,学者们的研究大多从粮食—石油的联动、粮食—金融的联动来探讨该次危机爆发的原因。例如,在粮食—石油的联动方面,Sheng-Tung Chen等从供给层面和需求层面解释了油价对2008年粮价的影响,指出不仅存在成本推动效应,还存在油价上涨导致粮食需求增加的影响,从而进一步推高粮食价格^[2];仇焕广等认为,国际能源价格、生物燃料能源、市场投机以及各国贸易限制措施等是导致2008年粮食价格剧烈波动的主要因素^[3];马凯等则以相关数据为基础,得出能源价格与粮食价格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结论^[4]。在粮食—金融的联动方面,陈秀兰等研究了国内主要粮食产品现货价格的周期性波动因素,发现中国粮食现货价格的周期性波动仍然主要由供需层面因素决定,但金融化因素的作用越来越明显^[5];Schmitz等实证研究了美国、欧洲和巴西三个期货市场的玉米价格波动传递效应^[6];杨培炯探讨了次贷危机以来美元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带给全球粮食市场的冲击,指出美元的一系列操作导致全球粮价高涨,在此过程中美国的粮食霸权和金融霸权得以强化^[7];樊琦等分析了投机资本在2008年粮食危机中扮演的角色,指出粮食金融化演变的趋势及其风险以

及中国的对策^[8]。本文以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为研究起点,从粮食、石油、金融三个不同领域在危机中的联动视角着手,探讨粮食危机在当年石油危机、金融危机的催化及相互影响下的先发作用以及后续发展,试图厘清粮食危机的深层内涵与外延,以史为鉴,为新时代仍存在粮食危机风险的我国提供政策决策的启示与建议。

一、2008年爆发的全球粮食危机

(一)20世纪70年代粮食危机之后的世界

20世纪70年代,全球爆发了战后的第一次粮食危机。粮食危机之后的第一次粮价高峰期出现在1980—1981年,在这期间,主要粮食出口国出现粮食减产,其中主要以大米价格为外显,大米的价格飞速增长至每吨300美元。第二次粮价高峰出现在1989—1990年,该阶段的世界市场小麦价格上涨至每吨175美元,随后该上涨趋势被欧共体与美国的出口补贴政策迅速打压。第三次粮价高峰出现在1995—1996年,该阶段由于俄罗斯与东欧地区的粮食出现大幅减产,国际市场的粮食需求出现增加趋势,刺激了粮食价格的大幅上升。根据有关数据的分析,在第一次粮食危机爆发之后的世界市场,国际粮价的相对变化带有周期性的特点,大概以7—8年为潜在危机凸显周期^[9]。而自1996年的粮价高峰期之后,一直到2007年左右,世界粮食价格一直处于高位下行与低位盘整阶段,小麦、玉米、大米等重要粮食产品的价格一度下降到1995—1996年历史高位的40%左右,全球度过了十年左右的粮食安全时期。

1989年前后,东欧剧变发生。1991年,苏联解体,曾经的美苏争霸格局不复存在。而美国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后成为了全球唯一的超级强国,是世界粮食市场上重要的大宗商

品出口国,掌握世界粮食定价权的四大粮商中有三个属于美国,可以说美国在世界粮食市场中扮演着更加举足轻重的角色。与此同时,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元无法继续与黄金挂钩,但是美元在世界交易中所形成的巨大信用惯性仍然使其成为占据全球最大比例的交易货币,许多国家的货币仍然通过固定汇率制与美元挂钩,华尔街仍然是世界金融的交易中心。同时,美国资本致力于与中东地区的产油国进行合作,以保证其拥有稳定可靠的石油进口来源并左右石油等能源市场格局。美国在冷战结束之后的粮食、石油、金融领域的全球领导力事实上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美国也成为了世界上几乎唯一可以灵活利用粮食—石油—金融三个不同领域联动关系来维护其国际霸权地位的国家。

(二)2008年粮食危机的爆发

业界普遍认为,世界上出现的粮食危机主要呈现三种形式:一是粮食价格高涨严重超过了国民购买力,造成社会动乱;二是在粮价未发生飞涨(可能是政府限价)的同时,出现粮食供应短缺甚至中断,造成人道主义危机;三是对世界上的粮食进口国而言,可能因为高粮价出现国际收支恶化,进而造成债务危机与金融危机。相比于之前的粮价高峰期,2008年的粮食危机在于全球各种主要粮食的产量都大幅降低。

根据美国农业部2008年发布的信息显示,全球大米的库存量已经跌至7520万吨,创1980年以来的最低值,相当于21世纪初库存水平的50%左右。而全球的粮食储量只有4.05亿吨,创25年来的新低纪录,仅够全球人民食用8周至12周。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一些传统的粮食出口国在本次粮食危机中甚至也转向国际市场进口粮食。比如,当时世界第二大小麦和大米生产国的印度,在1999—2005年没有进

口过小麦,但在本次粮食危机爆发之后,印度宣布限制或禁止大宗粮食出口并转向进口粮食。

上述三种粮食危机的表现形式事实上在2008年爆发的危机中均有显现。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统计数据来看,世界粮食价格在2007—2008年的一年之内上涨了42%,2008年3月的粮食价格指数比2007年同月上涨57%,其中3月份国际市场的小麦、大米、大豆、玉米的价格分别上涨了137.5%、66.6%、79.2%和36.4%^[10]。2008年3月27日,泰国大米的出口报价甚至相较于2月暴涨30%,创下新高^[11]。在高昂粮价的压力下,联合国的人道主义粮食救援计划面临着巨大的财政亏空,为此不得不压缩粮食援助规模,这意味着更多人将面临饥饿的威胁。2008年4月6日,在埃及首都开罗爆发了抗议食品价格飞涨的罢工罢课运动,引发了社会的严重骚乱;依赖外界粮食进口的加勒比岛国海地的拉萨林贫民区中,两杯米的价格就达到了60美分,当地居民甚至需要依靠泥饼干“特雷”充饥;在阿富汗,小麦价格已经上升了67%,购买面包和其他食品的开支占据普通家庭日常开支的近一半。在严格价格管控下的朝鲜,尽管粮价未发生飞涨,但当地的粮食产量不足以及世界粮价飞涨所造成的难以购入粮食,导致当地发生大规模粮荒,越来越多的人依赖野物充饥。

二、全球粮食危机与能源领域的联动作用

(一)粮食能源化加重粮食危机

早在2006年11月,美国粮食问题专家莱斯特·布朗就曾警告世人:爆炸性的美国乙醇生产用粮需求,将威胁世界粮食安全和政治稳定。美国作为世界上重要的粮食出口国,依靠其得天独厚的农业生产条件与较为先进的农业集约化生产技术,每年会产生大量的粮食剩余,这也是世界粮食市场供应来源的重要部

分。但自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2005年8月签署《能源政策法案》以来,美国开始利用其国内的剩余粮食大力推行生物能源政策,即通过玉米等作物进行燃料乙醇的生产。2006年,美国用于生产生物乙醇的玉米总量达到了4 200万吨(可以满足1.3亿人一年的口粮需求)。仅2007—2008年,美国就用掉了至少8 100万吨玉米。世界银行负责人甚至认为,美国的生物能源政策要为国际粮价的上涨承担65%以上的定量责任^[12]。按照美国的新能源法,2022年美国生产乙醇消耗的玉米达到1.8亿吨,这是“富人的汽车最终会吃掉穷人的面包”的真实写照。小布什政府时期(2001—2008年)也是美国生物能源战略实施的第一个高峰,小布什政府致力于出台一系列研发、生产和流通的生物能源发展法案,引导建立统一的生物能源准入标准,掌握世界生物能源发展主动权并通过各种激励措施鼓励生物燃料的生产和实际应用。2008年的粮食危机是粮食能源化的一次生动外在表现。

毫无疑问,对美国而言,粮食能源化将缓解潜在的能源危机,使其降低对中东国家的石油依赖,强化美国在能源市场乃至政治领域的国际霸权,对美国国家战略总体有利。但是,国际粮食市场的供给会因此进一步减少,国际粮价进一步上升,那些粮食进口国或者缺粮国家的利益将会受到损害。将余粮用作生产生物燃料,不仅增加了美国农场主的收入,而且减少了美国国内粮食储存的成本,减轻了美国纳税人的负担,因此,美国的生物能源法案实施预期并不会受到美国民众的掣肘。作为粮食的出口国,美国国内的粮食价格冲击预期很大可能会被降到最低。在2008年,由于美国本身的粮食供应会优先本国且具有大量剩余,缩减的只是对外贸易量,加上生物能源法案的冲击,美国具有粮食定价权而且还可以通过高

价攫取利益,粮食危机的爆发也就不足为奇。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根据2009年有关人士的分析数据来看,美国强力推出的生物能源计划事实上对降低美国对海外能源的依赖作用相当有限,更大的作用在于对较为高昂的农产品价格形成长期的支撑,美国通过玉米提炼的乙醇能为其节省的石油可能不到当年存储量的1%,但是这部分能源化的粮食消耗却足以使全球粮价上涨40%左右^[13]。

(二)2008年前后油价的同期变动以及背后的粮食因素

2008年1月,纽约原油期货小幅下挫,1月23日触及87.65美元每桶的月内低点。但是2月之后,国际油价开始飙升。3月13日、5月5日、5月21日和6月26日分别突破110美元每桶、120美元每桶、130美元每桶和140美元每桶。7月11日则达到147美元每桶的历史高点^[14]。整体来说,当年的石油价格很不稳定,这毫无疑问受当年金融危机的影响。美联储在2008年1月22日降息75个基点,1月31日降息50个基点,3月19日降息75个基点,5月1日再度降息25个基点。美元的快速贬值加上市场投机资金炒作,带动当时现货黄金突破1 032美元,也推动国际原油价格一路上涨。当年油价的不稳定与前些年的油价增长是美国迫切希望强化能源霸权的内在驱动力,而当年石油价格不稳定也对当年的粮食危机造成了影响。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油价不稳定的背后,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粮食因素。在国际粮食市场上,以中东国家为代表的主要投入市场能源产品(主要是石油产品)的国家作为世界上的粮食进口国的地位并未改变,而这些国家在这段时间里人口数量的上升与营养结构的优化进一步提升了其粮食需求。世界粮食市场上的粮价高涨一定会对这些石油出口国的国际收

支情况产生冲击,因此,这些国家就通过客观提升油价的倾向以维持其国际收支平衡,从而打通这条粮食到石油的影响传导路径。

(三)油价频繁大幅变动加剧粮食危机

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来说,运费是粮食价格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世界上重要的粮食出口国,如美国、加拿大、巴西等相对于世界人口最集中的欧亚大陆而言路途遥远,在运输过程中往往需要大量的船舶、火车等运输工具,其中就必不可少的会有能源产品的消耗。在2008年,油价的长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运货商在粮食物流中的成本投入。上涨的油价作为一种直接性的因素提高了粮食价格,加剧了粮食进口国穷人的压力与负担,从而客观地加剧了粮食危机。

三、全球粮食危机爆发与金融危机之间的联动

(一)2008年前后的金融危机

2008年金融危机是自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之一,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危机是指一场发生于美国,因房地产泡沫破灭、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金融市场剧烈动荡而导致的金融风暴。它源于美国的房地产市场,也称美国次贷危机。该危机从2006年春季初现端倪,2007年开始席卷美国、日本、欧盟等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从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美国策源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并不是一件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

2000年,当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之时,为了刺激经济复苏,美联储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实施了连续的降息行为,美联邦基金利率不断降低,美国政府试图通过大幅降息的政策来刺激房地产市场的繁荣。美国国民的个人消费量

产出占GDP总量的70%左右,而私人投资仅占GDP的15%,从消费和投资的角度来分析,在个人消费总额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住房消费在美国当时的经济发展中具有明显的推动力^[15]。而当时美国的大多数中产阶级以上人群均已拥有住房,于是各项优惠政策与降息政策相结合,吸引低收入群体纷纷进入房地产市场进行投资和消费。低利率与流动性充裕的货币政策使低收入群体更容易获取信贷资金,低收入群体看中低资金成本与高房价带来的收益差,在21世纪初期大量举借债务购置远超自身购买能力的房地产。

在次贷危机发生的前夕,美国金融机构将已经抵押的房地产进行资产证券化改革,即次贷资产证券化以盘活资本和增加流动性,获取房价上涨的大额信贷收益。但是在具体操作中,金融机构将大量贷款发放给了次级贷款人,在享受信贷收益的同时,金融机构也吸纳了较多的泡沫资产作为抵押,导致自身的资产也出现泡沫化,为随后次贷危机的爆发埋下隐患。在次贷资产证券化后,金融机构利用手中的资本向次级贷款人发放贷款,缺乏购买力的次级贷款人纷纷贷款买房,人为炒作的房价越来越高,房地产泡沫越来越大。而为了国际收支平衡,美国政府通过加息,降低了房价并不正常的高涨,使资产价格不再上涨并转而下跌,这也就戳破了房价泡沫。暴跌的房价使得次级贷款人无法再偿还贷款,于是众多的投资者和金融机构纷纷被套牢,由此引发的次贷危机一发不可收拾^[15]。

在次贷危机的冲击下,许多美国大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并且大批次级抵押贷款公司纷纷停业关门。接下来,对冲基金、投资银行等机构投资者受到冲击。与此同时,保险公司、商业银行等其他金融机构也受到波及。2009年,美国有140家银行倒闭,由于美国和欧洲的许多投

资基金买入了大量由次级抵押贷款衍生出来的证券投资产品,所以,美国之外的金融企业也遭到了冲击。商业银行巨头RBS等欧洲大型银行纷纷国有化,保险公司AIG被美国政府接管。金融机构的危机造成资产抛售、市场恐慌,资不抵债的情况加剧,资产价格进一步下降,形成资产负债表衰退循环。

(二)粮食金融化的趋势

粮食生产有其特殊性,每到收获季节,粮食在短时间内集中上市,供给量大大超出当地市场需求,期货市场初步形成时的交通情况又难以将大量粮食产品及时输送到粮食消费区,加之仓储设施的不足和匮乏,粮食经销商很难采用“先大量购买再见机销售”的途径,因此,农产品价格出现了严重不稳定的现象。为此,粮食经销商设置了商行以收购农场主手中的粮食,以远期合约的方式签订第二年春季的供货合同,提前确定收购粮食价格以保证双方的利润需求。

随着美国农业的发展和金融市场的发育成熟,美国的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开始在农产品贸易中占据越发重要的地位,该交易所提供的小麦、玉米、大豆等期货价格不仅成为美国农产品交易的主要参考价格和权威价格,而且掌握了全球农产品交易的话语权。并且,该交易所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通过电子交易系统和公开喊价等方式,拥有3600多个CBOT会员交易50种不同的期货与期权产品^[16],并随着金融期货合约的推出,期货交易逐渐引进多种不同的金融工具,包括美国国库中长期债券、股价指数和利率互换等。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的农产品期货主要用于商业套期保值,对非商业参与者的交易实施限制。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开始转向自由放任政策,首次允许免除农产品投机交易限制。2005年,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扩大了在期货市

场上购买或出售小麦、玉米、燕麦和大豆数量的交易限制。同时,美国政府还通过为农户提供保费补贴等形式,鼓励农户使用农业保险。大量保险金融资本进入农产品期货市场,加大了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加深了美国金融资本与粮价的关系。粮食的期货化导致金融投机活动转向粮食作为大宗商品贸易的可能,粮食市场与期货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衍生品市场的交互作用形成了多元的金融体系,从而粮食市场表现出“金融化”趋势,粮食作为重要的期货产品会对世界金融体系产生影响。

(三)金融危机与粮食危机几乎同时发生的联动因素

巧合的是,2008年前后的全球金融危机与粮食危机几乎同时发生,这就促使人们开始思考可能存在的互相影响的因素。在金融危机发生过程中,国际游资市场对粮食这一大宗商品的炒作导致粮食危机的爆发与加剧。从货币视角来看,人们可以关注到粮食美元化的概念,即粮食市场与金融市场联动性增强,投机炒作增加。美国推动粮食金融化,将美元霸权与粮食霸权绑定。粮食市场、现货市场与远期市场的美元过剩流动冲击粮食市场,引起粮价剧烈波动,粮价的波动不断对美元过剩流动性进行“消化”。粮食贸易的“金融化”从根本上看是通过金融方式将美元资本与世界粮食贸易结合的过程。从一般货币资本视角来看,大宗商品金融化意味着货币流通量过大引起大宗商品期货价格的大幅度波动,之后传递到现货市场,进而影响大宗商品的价格。而从货币金融视角来看,粮食金融化主要表现为金融货币发行过多,游资过多,从而引起粮食价格波动。剩余资本进入粮食市场后,影响了金融市场上的投机需求,进而引起了粮食价格波动,放大了市场交易风险。李援亚认为,粮食金融化是指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对粮食产业进行资金融通和资本运

作,而金融体系则是通过汇率、利率等的变动对粮食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产生影响^[17]。张振霞认为,粮食金融化是指粮食市场与货币市场、期货市场、衍生品市场及外汇市场相互联动的金融体系,而粮食产品在商品交易所的标准化期货合约与其他金融衍生品的交易中具有金融属性^[18]。由此可见,粮食价格变动主要源于资本和货币的流动而非粮食本身的供求。粮食金融化是一个动态而非静态的趋势,粮食市场受到金融因素的影响逐步加强,粮食的金融产品属性也逐渐显现,粮食期货、商品指数基金等粮食投资功能也呈现不断加强的态势。

提到当今世界的粮食市场格局,就无法回避几乎垄断世界粮食交易的世界四大粮商ADM公司、邦吉公司、嘉吉公司以及路易达孚公司,其中前三大粮商均为美国企业,路易达孚公司是法国企业。它们在2008年的世界粮食市场上控制着国际谷物80%以上的市场份额。这些公司不仅在本国粮食市场上有着垄断力量,而且把巴西、阿根廷等国家政府部门的农业机构进行收购,从而加强其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这些世界性的大粮商控制了从种子到化肥、从仓储到运输、从生产到消费的整个粮食产业链条。而自从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国际游资急于寻找出路。风险较低且价格一路上扬的农产品期货便成了金融“大鳄”的“盘中大餐”,投资者在股市疲软时期会转向初级产品市场,粮食成了绝佳的炒作对象,四大粮商在国际市场上的定价权进一步得到加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广大的粮食消费者成为了金融投机的主要牺牲品。四大跨国粮商以“生物能源计划”、生产国面积减少、天气干旱等因素对粮食价格进行炒作。再加上预期到了潜在的通货膨胀,期货价格不断拔高,四大粮商赚得盆满钵满。从2007年12月到2008年2月,主营玉米、大豆加工行业的ADM公司收入同期上升42%,嘉

吉公司同期净收入上涨86%。粮价飙升更加吸引本应投入到解决次贷危机的热钱进入粮食期货市场,从而使得国际金融危机加剧,因此,国际金融危机与国际粮食危机同时发生。

四、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爆发的其他原因

除了上述的传导机制以外,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的爆发也存在其他客观原因。

(一)产业结构

事实上,在美国占据优势的全球粮食市场上,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的第一次世界粮食危机之后,全球市场的粮食价格始终偏低。大部分原因在于廉价的美国家粮食的强势介入。基于资源禀赋和农业技术的发达,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第一粮食出口大国,也是重要的粮食生产大国。2007年,美国玉米产量占全世界的34.4%,大豆产量占全世界的42.7%,小麦产量占全世界的11.6%^[13],而同年美国人口不足世界人口总数的5%。大量的美国粮食进入世界市场毫无疑问是粮食进口国家的福音,但是美国却在粮食上附着了更大的政治因素。低廉的美国粮食摧毁了许多国家的粮食生产体系,使一些国家自给自足的本地化食品体系逐渐瓦解,并成为世界产业化食品体系的消费者。低廉的世界粮食价格也让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对本国的产业结构安排产生了错误的估计,它们更多地倾向于工业而非农业的发展,以致力于更快地实现现代化。其中,人口大国菲律宾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2008年世界粮食危机前后,菲律宾将发展目标转变到了快速实现工业化,并将大量的已有耕地从传统种植的稻米转向经济作物,其国内大量的粮食需要国际市场的供给。因此,在2008年的世界粮食危机中,菲律宾一度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稻米进口国,出现了严重的粮食危机。

(二)人口暴涨与营养结构的升级

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人口在2008年达到了68亿人左右,而这一数据在战后第一次粮食危机的1974年仅为40亿左右。在全球范围内的这段时间,无论是世界人口的整体生育率还是人均寿命都有所提高。其中,世界人口的主要增长量在发展中国家,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口快速增长的地区同时也是粮食进口国。与此同时,在世界范围内,人们的营养膳食结构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人们对肉类的消费处于不断增加的趋势,其中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大量的土地用于发展畜牧业,而在耕地客观减少的同时,畜牧业发展需要大量的饲料投入。在世界范围内,饲料的主要成分是大豆、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由于食物链客观存在的能量损失,生产肉类的耗粮比一般可以达到1:3甚至更多,即获取一千克肉类往往需要消耗三千克以上的粮食。在人口增长与人均耗粮量双重增加的背景下,粮食需求端的持续旺盛以及粮食危机的潜在风险增加也就不足为奇。

五、启示与政策建议

(一)以史为鉴,明确粮食、石油、金融三者联动的巨大作用

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在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爆发的过程中,能源因素与金融因素的巨大作用。生物能源的强力开发与油价高涨对粮食价格上涨的直接性影响使得粮食危机与能源危机出现联动作用,期货价格的炒作使得粮食成为金融产品并且其金融属性越来越无法忽视,粮食危机与金融危机常常相伴发生。以史为鉴,我们需要慎重处理好粮食、石油、金融这三个领域的联动关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

手中”。面对粮食能源化和粮食金融化的趋势,我们该如何全面夯实粮食安全的根基?一是主动参与国际竞争,支持本国的粮食企业发展壮大,以全球视野建立完整的粮食全产业链,增加粮食产业的附加值,拓展农业的价值链。二是在粮食能源化方面特别是在生物能源的发展方面,应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发展生物能源,有效兼顾粮食安全与能源安全二者的平衡。三是在粮食金融化方面逐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四是在粮食贸易方面更多采用人民币交易的方式。与此同时,扩大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的交易规模,增加交易品种,加强政府的监管,以规避各种金融风险。

(二)明确美国在联动过程中的领导与霸权地位

在当今世界,美国有能力也有动机在粮食、石油、金融三个领域起领导作用。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具有强势期货定价标准作用的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位于美国,拥有国际市场粮食定价权的三大粮商是美国企业。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能源生产与应用国,其出台的能源法案在很大意义上促进了美国的生物能源发展,同时,美国也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能源开发技术,有足够的余粮进行生物能源的开发研究,中东国家与美国在石油开发上的合作也日益深化。美国是目前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美元仍然具有无法撼动的强大地位,其作为世界上最常用的结算货币占据着交易市场上的最大结算份额,仍然有大量的国家和地区与美国实行固定汇率。因此,美国国内爆发的次贷危机以及其采用的金融手段有可能对世界市场产生影响。

(三)守好我国粮袋子,减少潜在粮食危机对我国的冲击

为了应对潜在的粮食危机,要坚守好我国的粮袋子,提升我国粮食自给率。当前,我国

不同粮食品种的自给率基本上都能保持在90%以上,但以大豆为主的部分粮食作物仍然需要国外的大量进口(大豆的自给率不足15%),这就极易在粮食危机爆发之时受到严重冲击。我国应当继续推进农业技术创新,守好耕地红线,尽力完成粮食尤其是大豆自给;通过粮食收储市场化改革,鼓励民间仓储;规范粮食应急保障制度,加强监测预警,提高政府调控粮油市场的应急应变能力;建立海外粮仓,保障国内土地休耕。筑牢国家粮食安全防线,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

[参考文献]

- [1] 王群瑛,王晓宁.石油、粮食、金融和霸权:威廉·恩道尔四本书述评[J].高校理论战线,2010(3):56-61.
- [2] Chen S T, Kuo H I, Chen C C. Mode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il price and global food prices[J]. Applied Energy,2010,87(08): 2517-2525.
- [3] 仇焕广,杨军,黄季焜.生物燃料乙醇发展及其对近期粮食价格上涨的影响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9(1): 80-85.
- [4] 马凯,潘焕学.我国粮食价格与能源价格的互动关系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3(2):55-56.
- [5] 陈秀兰,许可.我国主要粮食品种价格波动的金融化因素研究:基于对小麦和稻米数据的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9(8):71-74.
- [6] Schmitz J, Ledebur O. Volatility trans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futures markets during the 2007/08 price surge[J].Landbauforschung,2011,61(04):273-282.
- [7] 杨培垌.粮食金融化背景下粮食安全问题研究[J].世界农业,2013(3):9-11,30.
- [8] 樊琦,刘满平.国际粮食金融化趋势与我国粮食安全对策[J].宏观经济管理,2012(7):32-33,51.
- [9] 杨晓智.世界粮食贸易格局及趋势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9(12):9-15.
- [10] 冷崇总,姜瑞红,陈文君.全球粮食价格上涨及其原因与效应分析[J].价格月刊,2008(7):31-34.
- [11] 唐风.新粮食战争[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8:2.
- [12] McMichael P. The world food crisi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J].Monthly Review,2009,61(03):44.
- [13] 徐春祥,王海兰.21世纪,靠谁来养活中国?[J].中国图书评论,2009(6):12-17.
- [14] 2008年国际油价为何暴涨暴跌[EB/OL].凤凰网,https://ishare.ifeng.com/c/s/7nwNVbXnpcY.
- [15] 赵立三,刘立军.“收益率宽幅”与美国次贷危机再回顾[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6): 103-109.
- [16] 孙林,倪卡卡,李显戈.中美粮食期货价格波动的动态关联:基于DCC-MGARCH模型的实证分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65-72.
- [17] 李援亚.粮食金融化:界定、背景及特征[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2(10):42-45.
- [18] 张振霞.粮食金融化视角下粮食安全问题思考[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6(2):195-198.